

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之理论溯源

● 魏延秋

摘 要:本文集中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指出她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思想指导下,对苏区革命文化事业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对于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理论渊源

中图分类号:E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6)02-0040-08

作 者:魏延秋,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讲师,博士

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党军事文化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同时也是对传统军事文化成果的批判与继承。她以其特有的博大、雄厚、深邃和鲜活的文化精神特征,展示其先进性,成为抗战时期指导军队建设和夺得战争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理论是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历史的经验证明,成功的军事实践,从来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回眸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的光辉历程时,不能不深入地探究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思想所发挥的重大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传统军事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通过对世界诸多战争和军事现象的研究,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战争、军队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理论的开放性体系,并在实践推动下获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正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得到最成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闪光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和推广,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吸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理论,并在抗日根据地这一空间中进行实践。可以说,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其中最为突出的几个理论观点,则奠定了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石。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关于战争的本质内涵,列宁曾精辟地指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政治的集中。”^①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上述思想,深刻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在指出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的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

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帝国人民援助的努力。”^③同时,他还以积极的态度指出,战争可以促进政治的进步,“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④毛泽东关于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而且将其娴熟地运用于抗日战争实践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成为观察认识战争本质的理论基石。

兵民是胜利之本 关于战争力量的来源问题,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观点各不相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思想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⑤的著名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系统的人民战争理论,形成了以人民战争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毛泽东全面科学地概括了士兵和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⑥他把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作为我党在战争年代的中心任务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辩证法思想的基本观点。他指出: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它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⑦。毛泽东认为战争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支持战争,就会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能够解决。他在《论持久战》中更为清楚地指明了这点。他说:“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⑧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恩格斯在1858年评析印度民族起义的过程时,就提出了建立“作战中心”^⑨的重要主张,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经典作家关于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最早表述。毛泽东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把战争中的后方建设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加以思考,创立了内容极其丰富的根据地建设理论,这是恩格斯关于建立“作战中心”的主张,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中的巨大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人民战争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关于必须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毛泽东认为一方面它可以坚定人民革命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则可以造成对敌人的威胁,动摇其政治基础。他说:“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⑩。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阐述得更为透彻:“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⑪开辟根据地,依托根据地来取得胜利这是毛泽东“人民是战争的主体,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以人民战争这一思想为基点,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以“人”为核心的军事文化建设。军事制度的建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发展、军事文艺活动的蓬勃展开、军事教育训练的普遍实施等等,这些都是人民战争思想的深化和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思想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苏区革命文化实践为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苏区革命文化是新文化事业的奠基工程,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起点。它所进行的思想理论建设、政策法规建设、组织队伍建设、文艺产品建设等等,都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以及切实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创造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活动一直在延续。苏区文化对其后的抗日根据地文化、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发端于苏区文化建设,二者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没有苏区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就不会有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具体说,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区的教育成就为民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及军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是苏区军民搞好苏维埃建设事业的基本前提。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提高广大军民的文化水平,因此,普及文化教育成为苏区一切文化建设的基础。

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与群众政治上物质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⑫。对于儿童及青少年,苏区政府开办列宁小学,“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⑬,儿童入学率大大提高。对于成人,苏维埃政府通过创办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在士兵和工农中普遍开展识字运动,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形成了“子教父,媳教婆”的识字风尚。普及文化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以1934年的中央苏区为例:“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⑭。苏区文化教育的普及,带动了工农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苏区,不分男女老幼,许多人都明白《国际歌》的内容,明白《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的内容。许多以前不识字的工农分子,现在“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分别能解释。

对于干部的培养,苏区采用开办干部学校与干部培训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无产阶级干部。为培养苏维埃干部,先后创办、建立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红军大学、中央军委大学、女子大学等高级学校以及中央农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无线电通讯学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专业技术学校。为了培训各方面的干部,苏区先后开办了县级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土地税、商业税、合作社及会计工作训练班,银行专修训练班等短期培训班。此外,为培养教育工作者,还成立了初级列宁师范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等师范教育学校,大力发展苏区教育。

军队教育分为普及教育和训练军事干部两部分。普及教育在士兵中展开。红军中以连为单位,组织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工作。他们克服纸笔供应的困难,以树枝当笔、地皮作纸,在战斗或行军的间隙中,互教互学,随时随地学习写字。同时,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设有晚会、艺术、墙报、体育、文化等委员会。以连队为单位设列宁室,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只要有三天驻军以上的时间,墙报、识字课、讨论会等,大都能自动举行,不识字的现象,消灭得很快,文化水平一天天的提高。”^⑮大部分同志能够自己写信回家。军事干部的培训 and 军事专门人才的培养通过建立各级各类的红军学校实现。这些学校有:中国工农学校以及由它整编而来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等等。这些学校为军队培养了大批各级军事人才,充实了红军各部队,满足了创造铁的红军和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的需要。其中一些人成长为抗日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和领导骨干,为进行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苏区文化宣传成就是抗日根据地政治思想工作的宝贵财富。改变政权靠枪杆子,改变观念靠宣传。文化宣传工作是改造人的灵魂的工作,苏区一直把它放在头等地位,把它当成是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战斗号角。

红军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过程中,各部队都曾建立了宣传队,确定一定数量的宣传员,红军所到之处,都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把宣传工作当作“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要求“加紧宣传”,把“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等观念,“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⑯。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从苏区中央局到省、县、区、乡各级党部都相继建立了宣传系统。各个苏区都非常重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优化群众的心理素质,更新群众的文化观念工作。“紧跟着工作任务或战斗任务而来的就有文艺活动的协同动作”^⑰。“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⑱苏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党的纲领、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断地消除群众的疑虑,鼓励他们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在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中,极其广泛地传播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红军打到哪里,哪里就贴满了墙头诗、宣传画、革命标语,哪里的群众就在听革命演讲,学唱革命歌曲;哪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哪里的群众就在学习革命理论,就在演革命戏,各个苏区都沉浸在浓烈的革命文化的熏陶之中。这种有效的宣传连斯诺也在《西行漫记》中称赞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有力而巧妙的革命宣传活动,使苏区群众将无

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逐步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制约着人们对社会文化的取舍态度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新的文化心理。在文化宣传内容上,苏区的知识分子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工农兵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与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1934年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俱乐部纲要》中提出:“戏剧及一切表演的内容必须具体化,切合当地群众的要求,采取当地群众的生活的资料,不但要一般的宣传红军战争革命,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暗示妇女解放,家庭及生活条件等的革新,揭破宗教迷信的荒谬,提供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发扬革命集体主义和战斗精神。”^①杨尚昆在《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说的更加明确:“我们的宣传品必须简单、明了,为大众所了解;把握着群众脉息的跳动,鼓励和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每一种宣传品,都必须有时间性、地方性和充分的鼓动力量,各种宣传都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解释一切问题,从各方面来动员群众都要能够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心坎中,燃起革命的热情和造成极度的兴奋。”^②

苏区文化是在战争这个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工作的任务是实现革命的总任务服务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③1931年9月23日,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工作的任务和意义,是指导苏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文件。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把文化建设放到了重要地位,相继都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对文化工作的任务、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措施等都作了规定,提出了文化教育不能与政治脱离,与群众脱离,与劳动脱离的原则。为了让苏区人民更快更准确地了解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苏区文化除进行文化扫盲外,还要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如演戏、看画报、唱民歌、讲故事等)，“寓政治教育于娱乐之中”，从而达到提高苏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激发苏区人民革命热情的目的。红军中文化娱乐工作(俱乐部、列宁室的工作)，是“政治工作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发扬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出身贫苦的工农，不识字的占绝大多数，“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发扬红军战士们求进步的精神，以适应创造铁的红军”^④，这是培养战斗的、活泼的生活兴趣，革除不良习惯，提高文化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经过长征，红军的主力成为日后抗日的主要力量。这些军队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好做法一直保留并得以发扬光大。苏区革命文化建设为我军政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苏区军事斗争实践为抗日战争时期战略战术的制定和运用提供了经验借鉴。这一时期，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党的组织和各根据地红军，通过探索和不断总结战争经验，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对敌斗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座思想宝库。

这一时期，红军依托小块红色根据地，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不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其根本经验就是实行了广泛的人民战争。朱德在谈到中央苏区

反“围剿”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②毛泽东从那时起就始终认为,战争伟力最伟大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觉悟了的有组织的民众面前,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不可怕的。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的眼中是民众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所以,“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③。毛泽东联系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对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④他明确提出: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⑤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展。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指出这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保障。“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⑥“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⑦彭德怀在《争取持久抗战的几个先决条件》中也深刻地阐述了实行全民抗战的重大意义及如何实现全民动员的问题。他说:“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的身上;一个战争的胜败,也系之于人民的向背。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⑧徐向前提出的在平原创造“人山”的思想,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对人民群众力量伟大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解决了如何组织和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及争取最后胜利到来的问题,正确回答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贯彻人民战争思想的问题。是对苏区时期人民战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后来,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完全证实了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

在红军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党的组织和各根据地的红军,通过探索和不断总结战争经验,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毛泽东曾概括为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把退和进、走和打、防御和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达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依据这一战略战术,再加上毛泽东、朱德及各苏区红军领导人机动灵活的指挥,红军取得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及其它许多次战斗的胜利,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乃至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传为佳话。朱毛红军、中国红军的威名传遍天下。朱德就中央苏区的情况说:“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⑨十六字诀是我军战略战术的奠基石,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就是这一时期战略方针的相应转变和发展。

三、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为抗日根据地军事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任何先进文化都是开放性的体系,都是对以往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吸收、发展和创新。中华民族是富于优秀军事传统的民族,是军事文化之乡,军事文化积累之厚,层次之高

令世界为之惊叹。传统军事文化,同儒学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灿若星河的军事统帅和将领,不胜枚举的兵书典籍,三者互为促动、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我军先进军事文化,不仅借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等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也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继承,是在不断地进行文化整合、创造、提升中发展起来的。

1、“知彼知己”的传统战争认识论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一直就很强调知兵、料敌、知彼、知己。知己知彼这一朴素战争认识论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对传统军事哲学的“知彼知己”这一战争认识论进行了改造,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毛泽东首先肯定了这一命题,他称赞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既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①可见,毛泽东在肯定这一命题的同时,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去解释它,他指出:“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②这里,毛泽东把“知彼知己”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要联系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战争实践来理解运用它。在《实践论》中,他把这种战争认识过程进一步抽象为“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的总公式,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

2、“以仁为本”的传统军事伦理思想 在如何正确区分战争的性质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观点,也汲取了传统军事文化中的养分。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思想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仁为本。毛泽东也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了分析。1935年12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③之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④在《论持久战》中,再一次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⑤毛泽东还强调要从促进或阻碍历史进步的角度分析战争性质,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用革命制止战争、维护和平,通过革命战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从而最终消灭战争,是毛泽东军事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3、朴素的军事辩证法 军事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精华。大量相反相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兵书中屡见不鲜。毛泽东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指导,把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赋予其科学的内涵。象著名的《论持久战》,就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在文中,毛泽东对中日双方互相对着的四个特点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分析,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同时,毛泽东还把传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具体为一系列作战原则,用以指导

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例如,对于攻守关系,他指出:“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应该指出:战争的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从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⑩毛泽东在这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全面揭示了攻与守的辩证关系,自觉地把攻与守的关系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消长联系起来,并从战争主体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攻守矛盾关系思想。此外,类似的还有关于阵地战与运动战、持久战与速决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等相互关系的精彩分析。

注释:

①《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03 页。

②③④⑤⑦⑧⑪⑫⑬⑭⑮⑯《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9-480 页、第 479 页、第 457 页、第 509 页、第 480 页、第 477-478 页、第 418 页、第 388 页、第 490 页、第 466-466 页、第 465 页。

⑥⑩⑪⑫⑬⑭⑮⑯《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6 页、第 95 页、第 207 页、第 136 页、第 139 页、第 182 页、第 161 页、第 174 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4 卷,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6 页。

⑫⑬《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9-330 页、第 329-330 页。

⑬《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7 页。

⑮《湘赣革命根据地革命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11 页。

⑯《湘赣边界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 年 10 月 5 日),《湖南苏区文艺运动 湘籍作家在解放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 页。

⑰⑱⑲⑳《苏区文艺运动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8 页、第 37 页、第 247 页、第 266 页。

⑳《湖南苏区文艺运动·湘籍作家在解放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 页。

㉑《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 页。

㉒⑳《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1 页、第 131 页。

㉓《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2 页。

㉔《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 页。

(责任编辑 肖季文)